



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

智銘

甲、前言

目錄學之起源，在中國應有近三千年之歷史，文獻通考有謂：「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，以逆邦國之治，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……小史掌邦國之志；奠世系、辨昭穆。……外史掌書外令，掌四方之志，掌三皇五帝之書……小行人掌五物者（國札、凶喪、師役、福事、災禍）及其萬名之利害爲一書。其禮俗、政事、教治、刑禁之逆順爲一書。其悖逆暴亂作匿猶犯令者爲一書。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。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。」由此記載，可知在周之時，即已將有關的文字，分門別類予以歸納，各別爲一書。對書之管理，已具有相當嚴密之組織型態矣。又據文選任昉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畧曰：「尚書有青絲編目錄」這更表示已有目錄書了。

最有系統的目錄書而又傳存於今者，應爲班固（西二二七—二三九）所纂之「漢書藝文志」。而班固之此志，是根據劉向、劉歆父子之別錄、七畧而成者。章宗源在其隋書經籍志考證內說：「班固因七畧而志藝文。」班固漢書藝文志序中，對七畧之出說得甚詳：「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，故春秋分爲五、詩分爲四、易有數家之傳，戰國從衡，真僞紛爭，諸子之言，紛然散亂，至秦患之，乃燔滅文章，以愚黔首，漢興，改秦之敗，大收篇籍，廣開獻書之路，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，聖上喟然而稱之曰：『朕甚閔焉。』於是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下及諸子傳說，皆充秘府。至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

謁者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衍校數術，侍醫李國柱校方技，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錄而奏之。會向卒，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，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，故有輯畧、有六藝畧、有諸子畧、有詩賦畧、有兵書畧、有數術畧、有方技畧。今刪其要，以備篇籍。」至此，劉歆已將各種書籍依其性質類別予以歸納而成七畧。班固的藝文志，全效七畧，末句所謂：「刪其要」者，只不過刪去七畧中的「輯畧」，蓋輯畧並未表示出顯明的特性，無存在之必要，其他則「步步趨趨，不離於七畧」。（鄭漁仲語）。

是以，在實質上說，中國之有目錄，應是劉向父子開其端，班固繼之。自此之後，目錄之學逐漸發展開來，成爲一門有系統的學術了。在目錄的分類方面，劉向之時，是經傳諸子詩賦、兵書、數術、方技四大類，劉歆則擴爲七略。此後，幾經演變，有四分法、五分法、七分法、九分法、十二分法五種。其中值得特別說明的，是四分法，雖然在名詞上有四部、四庫之不同，但內涵則一。這種情形直到二千多年後清代所編的四庫全書，仍未脫離此一巢臼。所謂四分法，即是經、史、子、集，在四部（庫）之下再分類，茲將分類法列述於下：

經部：易類、書類、詩類、禮類（分六屬）、春秋、孝經、五

經總義、四書、樂小學（分三屬）。

史部：正史、編年、紀事本末、別史、雜史、詔令奏議（分二屬）、傳記（分五屬）、史鈔、載記、時令、地理（分

九屬)、職官(分二屬)、政書(分六屬)、目錄(分

二屬)、史評。

子部：儒、兵、法、農、醫、天文算法(分二屬)、術數(分

七屬)、藝術(分四屬)、譜錄(分三屬)、雜家(分

六屬)、類書、小說(分五屬)、釋、道。

集部：楚辭、別集、總集、詩文評、詞曲(分五屬)。

由這個分類法，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，這完全是以儒家的主觀，來籠黜百家，表彰儒術。」的思想作祟，完全是以儒家的主觀，來進行書錄的整理。佛家思想入我國已二千年，其在中國學術中之地位及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影響，足可與儒家並駕齊驅，但自隋志序開始以至清之四庫全書止之千餘年間，尊儒排異的思想牢不可破。釋教被列入「子集」之末，且「嚴定去取」，其歧視佛教，可以想見矣。

中國的學術，在戰國以前，爲「百鳥爭鳴，百花齊放」的時期，當時的各家思想，活潑、發達、進取。及秦之焚書，至漢之罷黜，唯儒獨尊，可是儒家在這二千年中，因沒有與之抗衡者，也就固步自封，不再長進了。雖然中間會有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，但讀其文，覺詞藻之優美有餘，而內容則空泛無物，其對佛家的批判，更覺膚淺幼稚，不值一哂。至於宋明之世，雖有理學之出現，但若沒有自唐興起的禪宗思想的刺激，理學是否能產生，仍值得懷疑。故學術貴在相長，如一味排他獨尊，必至抱殘守缺，不求長進。目錄學家姚名達先生在其所著「目錄學」中說：「我國學者，一向便被儒家經典束縛得不能動彈，甚至眼睛也被牠蒙蔽得變成鼠目寸光了，在目錄學史上，二千年來，幾乎毫無進步。始終不能打破七略、四部的規模，始終不能超脫劉向、荀勗的羈勒……那些所謂學者，目空一切，不知中國以外，尚有世界，儒家以外，尚有學術。所以不能探人的長，補己的短，以致整個文化，大體無甚進步，而有許多精微的學術，反而被儒家排斥而失傳了。……就事論事，目錄學史中，最值得我們敬佩的，仍是佛經目錄。」這一段話，可能是古今學者最客觀、最坦白的檢討評斷。姚氏認爲佛典目錄，所使用的方法，比一般目錄優勝

者有五：

一、歷史觀念發達：每一部佛典的傳譯淵源、譯人小傳、翻譯

時間、譯出地點，均詳爲紀載。

二、辨別真偽嚴格：凡疑僞經典，均仔細考證，嚴予甄別。

三、比較異同詳審：一經數譯者，詳爲列舉，比較異同得失，對抽出之別生經典，注明出處，使學者易於窮本溯源。

四、搜集遺佚認真：雖已散佚之經典，仍存其名目，以備後日採訪補充，並使學者瞭知何時代出有那些經典。

五、分類複雜而周密：或以翻譯時代分類、或以性質分類，同性質者，或照其涵義內容分、或照佛典形式分，學者檢閱方便。

佛經典籍浩瀚，如無周密分類之理想目錄，不但學者無法探索其中奧義，甚且有無從下手之感，故先聖先賢所爲之努力，實爲後世佛子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遺產。

乙、佛典東來之時代背景

印度的佛教，二千年前，何以能在地勢、氣候、風土、語言、習慣……完全不同的中國生根，而當時又正是儒家極力主張獨尊儒術的時候，何以未被排斥而消滅，反而日益茁壯發展開來，實在是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。中國原有的一些學說，都被儒家排斥得掩旗息鼓，即使頗能與儒家相頡頏的道家，也被逼得喘不過氣來。而佛教由播種、萌芽、生根、開花、結果，不但有後來居上之勢，且咄咄逼人，使儒家有招架無力之慨。佛教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優越的態勢，無他，乃佛教在心、性方面的立說，較儒家爲圓融、透徹、精到、無礙。因之，一部份儒家學者，爲崇敬、欣羨佛教而醉心學習。結果，他們不但不再反佛，反而成爲佛教的護法者，甚至捨家而出家者，亦大有人在。另一部份儒家學者，因自卑心理作祟，固執成見，一味冒昧反佛，但儒家能恃以反佛的條件並不太多，只有窮鑽佛學，以充實儒學，然後以之爲武器，反轉頭來反佛，如程、朱、王陽明、陸象山等之屬皆是。雖然如此，佛教仍能自我成長，儒家實莫奈之何。

丙、佛典集成及各家目錄：

佛教的發展，全靠佛典的蒐集、翻譯、註疏、整理而成爲一個非常有系統、有組織、內容豐富、典籍浩瀚的大藏經。故集成大藏，實爲佛教界的一件大而艱巨的事，但有心的祖師們，爲使大法常留久住，不畏一切困難而從事整理工作，茲將佛史上有名的佛典目錄分述之：

一、綜理衆經目錄

爲大藏經整理目錄之先驅者，應爲彌天道安，雖然在道安之前五十年，即晉懷帝（西三〇七—三一二）有聶道真集有「衆經錄」，但所輯者僅一人或一派之經典而已。而道安所集者爲「綜理衆經目錄」，包含當時已譯出的所有佛典，時在四世紀末（西三七四）孝武帝寧康二年，此目錄之出現，不僅現示出中國初期的佛典內容，而且是爲中國佛教之信仰與思想，打下牢不可破的根基。

據慧皎高僧傳：「自漢魏迄晉，經來稍多，而傳經之人，名字弗說，後人追尋，莫測年代，安乃總集名目，表其時名，詮品新舊，撰爲經錄，衆經有據，實由其功。」故道安之於中國佛教之隆盛，爲一關鍵之人，安錄內容爲何，因已失傳，無法詳爲考證，但似已被僧祐採入其「出三藏集記」中，故讀祐書可以知安錄，一如讀漢志可以概見七略者然。「綜理衆經目錄」之內容大概如次：

本錄第一：以譯人年代爲次序，自漢安世高至西晉末法立。

失譯第二：不知譯人姓名者入此類。

梁土異經錄第三：亦無譯人姓名，但知譯出地點。

關中異經錄第四：無譯人姓名，知譯出地點。

古異錄第五：約自大部經典中，摘譯之單篇本。

疑經錄第六：經道安鑑別爲僞造之經。

注經及雜經志錄第七：道安所註群經，及其他有關佛學之著述。

道安之「綜理衆經目錄」因當時之佛典不多，故只有一卷，但其優點有四：

一、經以年代爲序，使學者瞭知佛教發展之史跡，及諸家派別宗旨。

二、失譯的另成一部，以供後人俟機補正。

三、摘譯的另成一部，以性質分別，眉目清楚。

四、嚴定真僞，使學者知所去取。

道安爲中國佛教典籍立下這一宏基以爲楷模，自此，後繼之者，頻頻而出。

二、華林園佛殿衆經目錄

道安之後，即有外來僧鳩摩羅什入關，什對中國佛教的貢獻，是努力於佛典之翻譯，經他之手翻譯出的經典，不但有大乘經論，小乘之經、律、論也多被譯了出來，使中國漢文佛典內容頓形豐富。道安之弟子四哲中的僧紹（肇）、僧叡二人，「聞什至姑臧，自遠從之。」什得紹、叡之助，對譯、述、集、撰等工作，自更得心應手。僧叡曾撰什譯諸經爲「二秦錄」。道安再傳弟子道流集「衆經錄」，分爲魏、吳、晉、河西四卷。此二錄均是補道安之「綜理衆經目錄」的。此後即有宗齊錄、梁衆經目錄、魏衆經目錄、齊衆經目錄，以上各錄專錄一代，始興錄、廬山錄、華林園佛殿衆經錄，則專集一地。其中華林園佛殿衆經錄，是梁武帝爲防佛典散佚，蒐集漢文佛典集中華林園（又名逍遙園），命僧紹整理，乃編成「華林園佛殿衆經錄」四卷。

三、魏衆經目錄

北魏李廓，奉敕命集「魏衆經目錄」（西五三二—三），此目錄之特色：

一、大小乘分類。

二、經律與論分類，似爲廓首創。

三、未譯經論別存其目，僞書類分爲「非真」、「全非真」兩類，爲後來「疑惑」、「僞妄」分科之嚆矢。（未完待續）